

陈宇
／著

血火

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

｜ 历史变迁 · 红色记忆 ｜

江山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血火江山

——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

陈宇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火江山：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陈宇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 7

ISBN 978-7-5090-1123-2

I. ①血…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IV. ①K264. 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0491 号

书 名：血火江山——国共万里长征大较量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30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123-2

定 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引言

统观国共两党或者说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一生中的军事较量，较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这跨越三个年头的长征，再一个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长征中有着淋漓尽致发挥，而作为“陪战”对手的蒋介石，可说是彻底的失败。

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期间，自始至终指挥了国民党军及其地方军阀和民团对红军的作战。他先后调集了数百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除中央军的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外，还有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及马家骑兵等地方军阀部队。随着红军的长征进程，蒋介石带领“谋士”沿长征路另一侧，先后分别坐镇南昌、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督战，不能不说他竭尽了全力。但是，国民党军300多万的重兵却终未能挡住红军仅有的10万余人。

究其原因，蒋介石的失败，不但失在“斗勇”上，更多的是失在与红军的“斗智”上。这其中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和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外，若从国民党军方面找原因，问题恰好就出在蒋介石在追堵红军过程中多次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这3个方面。

其一，蒋介石违“天时”而动，注定要失败。“天时”即民心，在当时就是中华全民族的强烈抗日要求。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对中国继占东北后又染指华北。在如此国难当头的严重危机下，蒋介石南京政府竟置国难于不顾，倾全力于“围剿”红军。而红军在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不久，所打出的旗帜正是北上抗日，这顺应天时，合乎民心，由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曾仰天长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已经输在了违背民心上，仍不抗日，继续组织军队“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各地的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

后仅两个月，张学良、杨虎城就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成了国内局势转变的枢纽。这也正说明了民心所向，“天时”不可违。

其二，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频频失误，坐失“地利”的先机。在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军设置一道道封锁线，蒋介石也似乎达成了所期望的多个合围圈。为此，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多次召集国民党将领，特别讲解《孙子兵法》“地形篇”。他在贵阳的一次讲话中，竟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说红军已经陷入“围地”、“死地”，并说：“现在的军事，并不是打力量，比强弱，而完全是打计划，斗智谋。”然而，蒋介石的指挥却是一次接着一次的失策，如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的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过草地后的袭占包座等战役、战斗就完全出乎蒋介石所料。红军成功地跳出了“围地”、“死地”。就此，国民党军内部曾互相埋怨，上怪天，下怪地，怪罪红军的战术过于灵活，说“共军之行动，狡诈难测”，滇军称之为曲线动作，川军称之为太极图形，黔军称之为磨盘战术，中央军称之为旋风过野。这些都说明原来看似对国民党军有利的地形，却反变为对红军有利。

其三，国民党“追剿军”各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协同作战能力很差，根本谈不上“人和”。蒋介石在追堵红军的同时有一个“连环计”，就是乘机控制两广以及西南等地的地方政权。而各地军阀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和地盘，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明显产生了矛盾。他们貌合神离，明争暗斗，阳奉阴违，有些地方军阀对红军采取了“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因此，蒋介石纵使有数百万军队，也形同一盘散沙，往往是被红军击破一点，整个包围圈也就被打破了。在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就有人俏皮话连天，说：“可惜中枢握兵柄者，钳制川滇各军，不得擅自进退，而直属中央大军，与共军形成对立，亦不出击。于是养成各军畏首畏尾，各守阵门，自保实力，坐观成败，不肯牺牲，使共军得以暂停喘息，从容整顿，流连辗转，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剿共成为虚名，以至于大江大河失其屏障作用，重兵勒马平郊，观兵疆上，坐令朱毛从容逸去。”

长征已经成为历史。后人看到，原来对红军显然不利的“天时、地利、人和”，经雪山草地这个“大魔术箱”一过，转眼间反变为对红军的有利因素。红军长征胜利后，蒋介石及其部属和幕僚连连发出“自感才力不逮”、“有余憾”的哀叹。

国民党湘军总指挥何键反思道：“键当时于役戎行，恭承枢命亲执橐鞬与乎西路追剿诸役。每独居深念，既不能拾遗补缺有所献，替弭变乱于未事之先。复不能如乡先达曾人胡罗诸公，以乡兵平大难，澄清海甸，纾中枢西顾之忧。抚剑叹息，不能不自感其才力之不逮。”

川军将领杨森感叹道：“余率军督剿，曾川北川南野猪岗、菩萨岗、寒饭沟、猛虎岗、芦山、灵关、宝兴、懋功、达维，以及夹金山、折戈坝一带地区，屡予重创，数克要地，终以大局变化，不容偏师竟其功事。后思之有余憾也。”

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共军”总司令部顾问胡羽高论说道：“过去10省剿共之成绩，尽于此矣。今后朱毛徐张萧贺徐刘各股，既然合于会宁马营，复窜散于西北各省，则今后之剿共成绩，有无结果，可用古文两语作答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胡羽高的这段话，可说是被他言中了，因为经过长征的红军在仅13年后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舞台上，如此同一地域上的万水千山，如此同是征战三个年头，蒋介石与毛泽东共同走过。但是，历史却在这卷史书的封面上写下了不同的定论，这就是：

毛泽东凯旋到陕北，蒋介石败战长征路。

目 录

第一章 决战痛失根据地 长征踢出头一脚

1. 红军反“围剿”失利，彭德怀痛骂洋顾问李德：
“愚卖爷田心不痛！” 3
2. 蒋介石天文台静观天象 20
3. 毛泽东文武坝中畅吟“风景这边独好”，为长征突围探路于都河 35
4. 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南天王”陈济棠密令粤军为红军让道 49

第二章 湘江水飞血苦战 黎平大转兵恨晚

5. 周游北方的蒋介石失算，未料南方红军已远走高飞 63
6. 粤桂军阀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得知主力红军突围后慌忙南返 ... 80
7. 湘江大血战，中央红军折损过半 99
8. 白崇禧拍“七千俘虏”影片造假；红军黎平大转兵 117

第三章 毛泽东赤水四渡 蒋介石贵阳惊魂

9. 溪口雨夹雪，黔北阴转晴，毛泽东大写遵义 135
10. 蒋介石悬重金捉朱毛，毛泽东唱赋娄山关 160
11. 蒋介石入三峡进范庄，谨防毛泽东“五渡赤水” 183
12. 蒋介石惊守贵阳，国民党军长追入滇 212

第四章 战火烧会理包座 铁索寒雪山草地

13. 历史瞩目大渡河，红军泸定桥铁索上夺取一个时代 247
14. 中共常委握手抚边镇，国民党空军枉费弹药轰炸两河口 279

15. 惩抚刘文辉，转战毛儿盖，令人称奇的言说“二万里长征” 306
16. 国共两党内部同一个月中都闹分裂，红军过草地后激战包座 328

第五章 山水呼啸两万五 伟业奠基大西北

17. 红军合后又分，毛泽东深夜脱险，率队单独北上 353
18. 徐向前危急关头一言重千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368
19. 毛泽东六盘山握长缨“缚苍龙”，蒋介石紧跟踪
由西南飞大西北 382
20. 彭德怀横刀立马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393

第六章 三军铁流大会师 一代江山入画图

21. 张国焘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南下红军与川军大战百丈关 411
22. 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
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 433
23. 贺龙率部转战鄂、黔、滇、康、川，张国焘撤销“第二中央” 444
24. 红军大会师，蒋介石仰天慨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460

第一章

决战痛失根据地 长征踢出头一脚

鸟瞰遥遥历史长河，中华大地几多笙歌，几簇烽火？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朝代兴替主流大势；

武力南伐，文化北伐，多少英雄豪杰把这个“中国怪现象”演义成定格。

红飘带裹着南方潮湿的风，必须向北卷去吗？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是“大中国”的军事优势。

中国的国情也好，西方的地缘政治也罢，“打不赢就走”绝对是弱者的上上策。

1. 红军反“围剿”失利，彭德怀痛骂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1934年4月，赣南红土地，春的季节中却见不到成片的绿意。

山野间，战火冲天烧。烟尘浮动在半空中，遮天盖日。

大地被炮火犁过，埋下的不是等待秋天收获的粮食，而是带着弹洞的头颅和残肢。

人们有的打着枪，有的抬着伤兵，有的挑着粮食，匆忙地山道上奔跑。处处都在进行坚壁清野。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此役，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尔后红军的反“围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敲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占领广昌城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怎么这仗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越打越窝囊？肯定是总指挥出了大问题！”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

此时的中共高层军事指挥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呢？这事只有追本溯源，从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谈起。

那时的中共最高决策层，说来并不复杂，这是几个月前刚组成的。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和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设立中央书记处，亦称常务委员会，当时在中

央苏区的书记有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另外还有在苏联的王明和在川陕苏区的张国焘。

细心的读者由以上的人员名单可能会看出，这里好像缺少了一个红军史上的重要人物，此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逐渐排除了他对党、红军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这次党的重要会议上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从这个月开始，毛泽东只能去搞一些调查研究。不久，又以他的“身体差”为理由，安排他到会昌去“养病”。这样，毛泽东就被完全排斥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之外。

博古主持召开的这次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顶点。在军事指挥上，全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调整，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指挥权仍把持在博古、李德的手中。

请注意“李德”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领导人名单中不见其名的李德又是何许人呢？

说来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辛酸事。这个能参加中共高层决策的人物李德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中国人，他是广昌战役前半年刚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上过前线，并在巴伐利亚参加革命军队。1919年4月，他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6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后来越狱秘密逃往苏联。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来中国。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来到中国后，却借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号施令，蒙骗了许多人，至今在一些“史料”中仍把他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其实，据前苏联档案记载，李德是由苏军总部派到中国东北地区做情报工作的，他由于受不了那份苦，才到了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

就是这样一个“洋顾问”，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却对他十分

依赖和支持，在生活上给了他应有尽有的优惠，在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1公里处，给他建了一座独立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博古此时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竟荒唐地把红军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然而，博古的这位“洋顾问”，由于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也就只能凭教科书中的条条框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来强加推行。李德的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大家对他仍是处处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李德在“大权在握”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作战指挥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强制推行一系列错误做法，公然撤销士兵委员会，建立所谓“列宁室”，专搞文娱活动，不允许搞三大民主；在“反对游击主义”的幌子下，把红军三大任务限制在“打仗”一项上；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把适合于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削弱了部队的指挥和灵活机动能力；还打乱红军、地方部队、游击队的三结合体制，取消地方军，把一些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红军，又让红军分散活动，这样使得地方没有部队支持，红军主力疲于奔命，战斗消耗无法得到地方部队的补充，战斗力无法得到及时的恢复；在作战问题上大搞瞎指挥，战略上不承认战略退却，诱敌深入，实行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战役上不承认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把所谓“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用于作战指导，处处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把红军置于被动挨打地位；战术上不承认歼灭战，一味搞消耗战，把阵地防御中的反冲击当成歼敌的主要手段，错误地夸大所谓“短促突击”的作用。

当时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在任中共党内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狂妄自大的李德不可能知道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他也不想去看。他一个人躲在“独立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10公里路程，他也不管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打败仗。

让人非常气恼的是，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就这样，在那所“独立房子”的指挥下，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只能是越打越让人提不起精神。

这时，在几块大的革命根据地中，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已受到较大的损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已向西转移，在川陕边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主力红二军团已改编为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流动游击。唯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损失不大。因此，蒋介石这次“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消灭中央红军，他集中了50万兵力，并把驻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军，再加上第19路军，集中“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与之相邻近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对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兵力部署是：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3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第19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5个师又4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北路军第2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9个师又3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在政治上，他继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其反动统治。在军事上，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并且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普遍构筑堡垒封锁线等，企图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在经济上，则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与此同时，对外加紧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对内肆意进行横征暴敛，筹措“剿共”经费，购买飞机、大炮等，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已发展至8万多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

当时，红军还失掉了一次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十分有利的机会。1933年11月20日，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以蔡廷锴等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为了镇压第19路军，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与江浙一带的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分由江西、浙江入闽，“讨伐”第19路军，而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这样，中央苏区的东面、北面压力大为减轻，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面对这种有利的形势，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三、红五军团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也认为，红军应在军事上与第19路军采取配合行动。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

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为第19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与第19路军在军事上进行配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博古、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19路军。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很快于1934年1月失败，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次大好机会。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调整其“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19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下辖第2、第5路军和总预备队，共16个师又1个旅、2个团；北路军下辖第1、第3、第6、第20、第26路军和总预备队，共25个师又2个旅、1个支队和3个团。然后，即命东、北两路军重新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从此，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最困难的时期，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

4月初，蒋介石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计划，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南路军攻取筠门岭，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3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的作战。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首先向广昌发动了进攻。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在前方另组临时司令部，朱德兼任司令员，博古兼任政治委员。朱德、博古和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实际上却是李德、博古决定一切。李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和减员很大等情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13师从福建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会同新从龙冈地区调来的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并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进行阵地战。

然而，广昌之战以红军的失利而结束，红军被迫向后撤退。

对于红军作战的失利，博古、李德不是认真吸取教训，改变冒险主义的做法，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军内，提出要“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逮捕了在黎川战斗中英勇奋战后为保存有生力量而带队撤出的萧劲光。博古、李德主张对他进行审判，开除党籍和军籍，判5年徒刑，无上诉权。

萧劲光在被关押期间，毛泽东特派妻子贺子珍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萧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在决定处罚萧劲光时，有的人主张杀掉萧，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王稼祥也几次拒绝签字。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反对下，才取消了对萧劲光的错误判决。萧劲光在被关押1个月后，到“红大”当教员，失去了带兵权，但总算拣了一条命。

萧劲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此前后，又不知有多少人因给李德、博古提意见而遭“肃反”。

不过在这时，也有不信李德的，对李德的瞎指挥怒不可遏，并当着李德的面据理力争，冒死大骂李德。

“妈的，这个仗还怎么能打得下去！洋鬼子，去他妈的吧！”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见到部队伤亡惨重，就指名道姓地骂起了李德。

广昌战役刚结束，彭德怀带着一身的刺鼻硝烟味，风风火火赶到前线指挥部面见李德。同行的，还有本军团政委杨尚昆。临离开部队时，彭德怀把仅有的一套旧军衣也背在包里，他预料在给李德提完意见后，就会被李德宣布逮捕，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因此，无所顾虑的彭德怀见了李德没有说几句话，就拍了桌子：“上个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坚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可你们就是不相信，而相信那些所谓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三军团1.2万人，将全部覆灭。现在，怎么样，广昌失守了！”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小心翼翼地把彭德怀的话翻译成俄语，以免出错。

彭德怀的手指几乎戳到了李德的鼻子尖：“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个所谓